



跨界记忆与物质适应：日本地下天主教的符号延续与跨文化重构（1597-1910）

刘子元 罗湘懿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中国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 11608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中国天津市西青区, 3003875

通讯作者*: 刘子元 E-mail: LiuZiYuan20041001@outlook.com

论文信息

关键字

隐秘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
宗教迫害；跨文化记忆；情感压
抑；物质适应；日本天主教；地
下宗教；宗教融合（syncretism）

摘要

本研究考察了 1597 至 1910 年间日本天主教宗教身份从公开殉道到隐秘实践的转变，聚焦“隐秘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地下社群中情感压抑、物质适应与跨文化记忆形成的互动机制。1597 年“二十六圣人殉道”事件后，德川幕府推行踏绘（fumi-e）仪式、寺请制度等政策，系统性根除公开信仰表达，迫使信徒转入地下活动。在长期迫害语境下，天主教的外在表现形式被内化的虔敬模式取代，情感克制与家族保密成为宗教存续的核心要素。本研究结合传教士记录、口述史、考古证据及教会文献，探讨了数代隐秘基督徒如何通过心理坚韧与符号创新维系信仰。1639 年后神职人员与圣事体系缺失，平信徒领袖主导了礼仪适应，形成融合天主教仪式与本土神佛习俗的混合性实践，在规避侦查的同时确保信仰延续。物质文化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家庭祭坛、伪装圣像及双重功能仪式器物，使信徒得以在家庭空间中开展隐秘崇拜。这些适应策略推动碎片化却坚韧的宗教意识，在数世纪隔离中代代相传。1865 年（尤其长崎大浦天主堂）与外国传教士重新建立联系后，梵蒂冈当局与长期孤立的社群之间，围绕信仰真实性与正统性展开复杂协商。这一相遇催化集体记忆重构，前地下信徒试图调和自身独特传统与教会体制教义。至 20 世纪初，苦难、隐秘与忠诚的叙事已固化为独特的跨文化记忆，后续被纳入日本国家史学叙事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本研究认为，日本地下天主教的存续并非被动生存，而是主动的文化再诠释与记忆韧性建构过程，为全球历史框架下宗教在压迫环境中的存续动态提供了重要启示。为理解边缘宗教社群在迫害环境中的韧性机制提供了跨文化范例。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从殉道到隐秘的转变

1597 至 1910 年间，日本地下天主教的宗教表达形式发生了深刻转变——从公开殉道转向策略性隐秘，这一转型根植于社会政治压力与内在认知适应的双重驱动。1597 年长崎二十六圣人殉道事件后，德川幕府接连颁布旨在根除外来宗教影响的法令，公开的基督教实践已难以为继[4]。初期以公开信仰行为为特征、最终走向殉道的抵抗形式，逐渐被更为隐蔽的生存策略所取代——通过秘密活动、伪装仪式与融合性礼仪形式实现精神存续。这一蜕变并非被动退缩，而是宗教身份的主动重构，需要进行重大的心理与文化调整。

随着外部迫害加剧，地下教会成员发展出复杂机制：既保存教义记忆，又规避侦查风险。这一过程涉及一种可被理解为“情感压抑”的现象——由于持续面临监视与惩罚的威胁，信徒刻意抑制与崇拜相关的外在情感表达。认知僵化（常见于长期承受压力或陷入抑郁性沉思的个体）可作为有益类比，帮助理解困境中的社群如何在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仍坚定坚守核心信仰(Joormann et al., 2011)。在此语境下，即便放弃关键神学信条可能保障人身安全，却仍无法或不愿为之，这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僵化，而这种僵化反讽地成为集体身份的保护机制。仪式实践以隐秘形式延续（如将圣母玛利亚伪装为观音崇拜、默诵祈祷文），印证了精神图式如何通过受限却坚韧的记忆策略得以保存。

此外，隐秘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的长期存续，体现了一种与认知科学中“适应性抑郁”模型相似的适应反应——退缩与减少外在参与并非功能失调的表现，而是智能的调节机制[6]。在敌对环境中，暂停公开宗教活动可被解读为一种深思熟虑的退缩，使教义的隐性研习与代际传递得以在无即时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这一潜伏时期促成了跨文化记忆的

形成——一种融合日本民间传统与残余天主教符号的混合宗教意识，在缺乏正式教会结构的情况下，通过口头形式代代相传。

物质适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隐秘宗教性。例如，棕枝主日以南天竹叶替代棕枝，或在佛教框架中融入基督教图像的家庭祭坛，均是抵抗性物质符号学的典型例证。这些器物并非单纯的实用替代品，而是承载复杂意义层次的载体，充当着分布式集体记忆网络中的节点。因此，隐秘行为本身成为一种生成性力量，催生了新的宗教表达形式，使信仰在数世纪的隔离中得以维系。

（二）学术目标

本研究的学术目标旨在探讨 1597-1910 年日本地下天主教语境中，情绪调节、物质约束与跨国记忆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此项研究试图超越传统史学叙事中以“殉道”为日本天主教存续核心主题的框架，转而提出一种范式转变——即理解情感压抑与具身适应如何在系统性迫害环境下促成宗教的长期存续(Morgado & Gaspar, 2005)。通过分析“情感压抑”机制（定义为：为回应政治压迫而刻意弱化宗教外在表达的行为），本研究旨在重构隐秘社群所采用的认知与心理策略：既维持教义传承的连续性，又最大限度降低外在可见性。

此外，本研究拟探究物质文化如何作为精神韧性的媒介，考察那些无需依赖正式教会结构、即可实现信仰代际传递的器物、家庭礼仪空间与编码符号系统。该研究路径借鉴跨文化记忆理论，将集体记忆视为动态过程——而非静态遗产——其形成受跨文化接触、流离失所与记忆协商的共同塑造(Anonymous, 2010)。研究将评估日本隐秘天主教徒如何通过本土认知框架重新诠释欧洲神学体系，进而形成混合性崇拜形式与身份建构，挑战单一化的宗教正统观念。

在方法论层面，本研究整合历史人类学、情感研究与记忆理论的跨学科视角，旨在为“敌

对环境中的宗教韧性”这一广泛学术议题提供理论贡献。研究成果有望阐明一个矛盾现象：制度性脆弱反而可能提升适应能力——这一现象在当代灾害应对研究中已得到证实，即社会资本与内嵌信任网络对生存结果具有显著影响(Anonymous, 2010)。最终，本研究致力于深化对“非国家介导型宗教存续”的理解，构建适用于其他困境中信仰抵抗场景的比较分析框架。

(三) 研究方法资料来源

在跨文化记忆与宗教适应研究语境中，历史研究对一手与二手资料的运用，要求采用方法严谨的路径解读文本与行为数据。教会档案、传教士通信、德川幕府法令等一手文献，为理解日本地下天主教徒的生活体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但对这些资料的解读，需结合二手学术研究构建的分析框架——将情感压抑与物质隐藏置于更广泛的宗教韧性模式中进行语境化阐释(Le et al., 2021)。迫害环境下宗教信仰的心理维度(如精神耐力与身份保全)，可通过跨学科视角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包括借鉴边缘天主教社群宗教性与心理健康研究的成果——在这些社群中，灵性不仅是应对机制，更是集体记忆的结构力量(Le et al., 2021)。同样，双相情感障碍合并物质使用障碍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凸显了解读困境中个体与系统性行为的复杂性，提示历史学家在将统一的能动性或理性归因于压迫结构中的行动者时需保持审慎(Anonymous, 2012)。因此，通过跨学科方法强化对多元资料类型的批判性运用，可为隐秘宗教运动的历史研究奠定更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二、德川幕府统治下的迫害升级

(一) 驱逐令与监视体系

17 世纪初德川幕府颁布的《驱逐令》，标志着日本基督教发展轨迹的关键转折点——尤其对在系统性镇压下仍坚持存续的地下天主教而言。这些法令始于丰臣秀吉 1587 年的禁令，并在德川家康及其继任者时期不断强化，它们并非单纯的象征性宣言，而是国家监视与社会控制整体机制的一部分，旨在根除外来宗教影响(Senthilkumar et al., 2024)。这些政策的制

度化催生了精密的监控机制，其中包括寺请制度（terauke）——该制度将佛教寺庙转变为国家官僚机构的延伸，要求所有家庭登记宗教归属，当局借此可通过宗教遵从度的差异识别潜在基督徒。

这一监视体系通过社区线人与定期人口普查（kentō）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无孔不入的审查环境，宗教身份已无法公开表达。对此，日本天主教徒发展出复杂的隐秘策略（隠れキリシタン），既包含情感压抑，也涉及物质适应——信仰通过家庭仪式、编码符号，以及伪装为佛教或神道教仪式的融合性实践得以保存。宗教表达从公开殉道（以 1597 年长崎二十六圣人殉道为代表）向隐秘存续的转变，反映了宗教生存模式的深刻变革，重新定义了敌对社会政治环境中个体信仰与集体记忆的关系。

此外，近代早期治理的技术局限并未阻碍高效意识形态管控体系的形成，这一体系预示了后来生命政治调控的发展。尽管当代数据聚类与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已能更精准地模拟能源系统中的区域变量（如生物质分布）(Alvianingsih et al., 2025)，江户时代政权却依赖类比式分类方式——基于血统、居住地与仪式行为对人口进行划分——以维护正统性。然而，与能模拟变量间复杂互动的算法模型不同，幕府监视体系基于僵化的二元对立（基督徒/非基督徒）运作，往往产生误判，并加剧社群内部的不信任。即便如此，其持续两个世纪的存续，凸显了制度化猜忌作为文化压制工具的有效性。

关键在于，长期隐秘状态带来的心理与精神代价使隐秘基督徒也经历了一种存在层面的选择：那些确保生存的实践（沉默、融合、仪式变形）本身，可能危及教义的完整性。这一类比揭示了长期困境中的生存不仅涉及外部规避，还包含内部妥协——保存机制本身或许会改变所保存事物的本质。

因此，跨文化记忆的形成并非静态传承，而是受省略、重新诠释与具身实践塑造的动态过程。口述传统、经修改的祈祷文与家庭圣物成为集体记忆的载体，在数代人之间维系

着碎片化却坚韧的宗教身份。强制沉默与记忆创新的互动，展现了边缘社群如何应对历史创伤，将迫害转化为共享叙事框架——即便在缺乏正式教会结构的情况下，这一框架依然存续。

（二）传教士网络与地下抵抗

若不考察跨国传教士网络与本土化抵抗模式的复杂互动，便无法全面理解近代早期日本地下宗教社群的形成与存续。16 世纪末耶稣会首次大规模传教后，丰臣秀吉及后来德川幕府对基督教的镇压，迫使教会组织与虔敬实践发生根本性变革。从公开殉道到隐秘崇拜的转型，不仅是可见性的变化，更是宗教身份的深刻重构——这一过程既严重依赖既有的跨洋天主教基础设施，同时也适应了国家监视带来的认知限制。这些隐秘网络通过一种可被称为“隐秘情感经济”的模式运作，其中情感克制与物质伪装成为社群生存的核心机制 (Spencer et al., 2017)。个体在高风险社会环境中（误判的表达可能招致告发）面临的认知压力，与当代心理学中“不确定性下的情绪感知”研究发现相呼应：地下教会成员或许已发展出对非语言线索的高度敏感性，能根据情境风险评估调节自身表达行为。

传教士通信与现存基督徒文献表明，17 世纪后天主教信仰在日本的存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葡萄牙、西班牙教会当局的残余联系——即便在外国神职人员被驱逐后，直接接触已大幅减少。以长崎为中心的隐秘基督徒（隠れキリシタン）通过口头传承的祈祷文、家庭祭坛（经改造的佛龕），以及规避踏绘（fumi-e）等象征性行为，维持了仪式的连续性，这些行为构成了表演性的抵抗实践。这些适应策略与生殖隔离的生物学模型具有共鸣——物种特异性信号机制在选择压力下演化 (Qiang et al., 2024)。正如夏威夷长脚蛛利用化学性质独特的蛛丝成分防止杂交，日本基督教社群也发展出独特的礼仪编码——既区别于主流佛教，也不同于官方神道教——这些编码强化了群体内部凝聚力，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外部侦查风险。这些仪式标志的独特性（尤其在多个隐秘教会共存的地区），暗示了一种类似“异

域物种形成”的文化分化过程，其驱动力并非地理隔离，而是社会政治分裂。

综上，这些维度——情绪调节、符号分化与具身实践——共同构成了坚韧的记忆生态系统，能够在超过两个世纪的禁令期间保存跨文化记忆。因此，地下教会成为边缘社群的典范：它们既利用外部网络，也依靠内部创新抵御同化，将迫害转化为文化巩固的催化剂。

三、礼仪创新与融合实践

（一）圣事仪式的适应性改造

1597 至 1910 年间，日本地下天主教的圣事仪式适应性改造，是极端迫害与社会政治压制环境下宗教实践的深刻变革。1597 年长崎二十六圣人殉道及驱逐令颁布后，德川幕府强化反基督教政策，公开教会结构被瓦解，日本基督徒被迫以隐秘形式重构精神生活。这一时期不仅是信仰的隐藏，更是礼仪表达的深层结构性蜕变——洗礼、圣体圣事、忏悔等核心圣事通过本土化物质文化与具身记忆被重新诠释，在系统性清除的威胁下实现传承[17]。

17 世纪中叶最后一批耶稣会传教士离去或殉道后，神职人员缺失，平信徒承担起前所未有的圣事主持职责，常基于碎片化的口头传承与记忆工具即兴创作仪式。例如，洗礼多使用家庭水源，祈祷文通过记忆背诵或改编为便于记忆的诗歌形式。这些修改本身并非教义偏离，而是体现了“仪式压缩”——将复杂的神学行为提炼为简洁却象征意义丰富的仪式动作，使其能够跨代传递。这种认知简化与神学研究结论一致：情感内容能增强记忆留存，而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圣事行为的情感效价既因迫害而被放大，又受隐秘需求的约束[17]。仪式知识的内化不仅是精神抵抗，更是跨文化记忆形成的过程——情感体验被嵌入非礼仪器物与日常生活惯例中。

物质适应对维系圣事完整性至关重要。十字架被伪装为佛教偶像，念珠隐藏于日常衣物中，家庭场景中的圣体则以米饼或清酒替代。这些替代并非随意为之，而是遵循符号学

逻辑：既保留神学意图，又规避侦查。此类象征替代物可通过“物质能动性”理论理解——器物本身成为宗教意义建构的主动参与者。日本隐秘天主教徒通过结构改造的仪式维持了圣事的有效性。

此外，圣事知识的传递高度依赖代际记忆，通常编码于歌曲、家庭祈祷与季节庆典中，与神道教-佛教习俗难以区分。这种语义伪装使教义内容无需明确表述即可保存，构成一种认知韧性。神经认知研究表明，特定神经条件下的个体对情感刺激与中性刺激的记忆模式存在差异，情感负载的体验会被独特地加工与存储[4]。对隐秘基督徒而言，殉道与隐秘带来的情感重量可能增强了仪式记忆的准确性，即便外在表达被最大限度弱化。凸显了创伤与虔敬在塑造认知轨迹中的作用。

最终，近代早期日本圣事仪式的适应性改造，展现了宗教社群如何通过符号创新、情感忍耐与物质智慧实现生存。这些变革并非正统性的衰退，而是教义与语境的动态互动——信仰并非因隐秘而存续，而是通过隐秘得以存续。

（二）与本土信仰的融合

宗教融合现象（尤其在边缘或受迫害社群中）往往是文化保存与精神延续的复杂策略。1597至1910年的日本地下天主教语境中，丰臣秀吉禁令及后续德川幕府锁国政策对基督教的压制，不仅要求物理层面的隐藏，更需深刻的神学与仪式适应。这一时期出现了“隐秘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他们通过与本土神道教、佛教信仰的复杂融合过程维系信仰，将基督教教义有效嵌入本土宇宙观框架。这些适应策略并非单纯的实用生存机制，更是深层的跨文化记忆形成过程：宗教身份通过符号替代与仪式重构得以保存。将基督教图像融入表面上的佛教或神道教形式（如崇拜融合圣母玛利亚与观音菩萨的“玛利亚观音”），表明物质文化成为情感压抑与教义协商的场域(Goh, 2009)。这些变革与散居及殖民背景下的宗教社群呈现出的普遍模式相呼应——外部压力催化信仰系统的内部重构。

与日本语境类似，加拿大印度裔加勒比基督徒也通过选择性记忆的叙事行为重构家族宗教史，在种族与宗教身份的夹缝中寻求定位(Bramadat, 2011)。尽管历史背景差异显著（加勒比契约劳工 vs 近代早期日本国家强制宗教禁令），但两类案例均表明，边缘社群通过融合实践调和传承传统与强加/受压制的信仰体系。在日本，传教士被驱逐后神职人员缺失，导致宗教权威平信徒化，“帐方”（chōkata）等平信徒领袖承担圣事职责，其口头教义问答中逐渐融入民间宗教元素。这一过程与印度裔加勒比基督徒在基督教皈依叙事中重新诠释祖先印度教信仰的方式相似——他们常将殖民时期传教活动定位为救赎力量，以对抗与非洲后裔相关的感知到的精神或社会堕落(Bramadat, 2011)。尽管此类叙事存在意识形态争议，但它们凸显了宗教记忆如何被选择性建构，以在结构性边缘地位下确认社群合法性。

此外，日本地下教会展现的适应韧性，呼应了阿帕杜莱·翁（Aihwa Ong）提出的“弹性公民权”理论——边缘群体在不完全放弃核心身份的前提下，策略性地在主导意识形态框架中重新定位自身(Goh, 2009)。在新加坡，基督教的制度性存在受国家强制多元文化政策及《维护宗教和谐法》等法律工具约束，教会需通过契合家庭凝聚力、宗教间合作等国家价值观的话语来彰显自身意义(Goh, 2009)。类似地，隐秘基督徒社群运用日本形而上学思想中的熟悉概念（如以“高天原”类比基督教天堂），重构基督教末世论与救赎论，实现了“无根基的现代性”——以表面顺从为伪装的信仰延续(Goh, 2009)。这种双重定位使天主教记忆在缺乏正式教会结构的情况下，跨越数世纪得以存续。

从比较人类学视角看，物质文化在强化群体特异性识别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正如夏威夷长脚蛛在共生物种中，通过蛛丝上的物种特异性化学信号维持生殖隔离，隐秘基督徒社群也发展出独特的物质标记——伪装为佛教数珠的念珠、莲花形十字架、编码于民歌曲调中的礼仪圣歌——以传递内部知识并维护教义边界(Qiang et al., 2024)。这些适应性改造的特异性（类似蛛丝提取物中的烷基甲基醚），充当了区分信徒与外人的符号屏障，确保即便在严密监视下，宗教实践仍能跨代传递(Qiang et al., 2024)。因此，这一语境下的融合既非同化

也非稀释，而是精密的符号加密形式，实现了隐藏与延续的双重目标。

最终，江户至明治时期天主教与日本本土信仰的融合，展现了宗教传统在长期外部压力下的适应性辐射。通过将外来神学融入本土符号系统，地下教会实现了一种文化物种形成——在保留本质的同时改变表达形式的演化分化。隐藏、适应与记忆的动态互动，凸显了困境中宗教身份的韧性，揭示融合并非妥协，而是文化生存的生成性行为。

四、身份谈判：重获接触后的正统性争议

（一）对真实性与正统性的协商

1597至1910年间的日本地下天主教，是长期迫害与社会政治边缘化环境中宗教真实性与教会正统性协商的典型案列。这一时期（从长崎二十六圣人殉道延伸至明治时代基督教获得正式认可），宗教表达模式发生深刻变革——教义忠诚日益通过隐秘策略、物质适应与情感克制得以传递。在维系神学完整性与确保社群存续的张力下，何为“真实的宗教实践”需经过复杂协商，尤其在神职人员与圣事体系缺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在此语境中，平信徒（多为女性与乡村农民）承担起前所未有的精神权威，主持隐秘仪式，并通过口头传承与符号替代保存神圣知识(Dorcic, 2005)。集体记忆保存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部分可通过“压迫环境下的情绪回忆”研究得以阐释：采用压抑型应对方式的个体，对高激活度负面刺激的延迟回忆能力下降，这一“情感压抑”的认知策略，与历史上公开宗教表达的压制形成呼应(Dorcic, 2005)。这种记忆过滤形式（创伤性或高度显著的体验随时间被选择性弱化），可能成为隐秘基督徒社群的适应性机制——既维系身份认同，又避免引发外部监视。

地下教会的物质文化进一步体现了正统性与适应性的辩证关系。虔敬器物（如隐藏于佛教造像中的十字架、伪装为佛教咒语的基督教祈祷文）展现出融合性实用主义，挑战了传统教义纯粹性的边界[27]。这些适应并非单纯的功能性举措，更承载着深厚的符号学意义，构成人类学家所谓的“边界器物”——即在不同文化与制度语境中仍能保持意义连贯性的器物。此类器物在日本西南部（尤其九州地区）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本土化抵抗及韧性网络一致的模式，受地形、贸易路线与人口连续性的共同塑造。资源制图中常用的地理空间方法虽有助于识别宏观定居趋势，却难以捕捉此类隐秘宗教运动中社会能动性与环境约束的微妙互动(Alvianingsih et al., 2025)。与依赖静态数据聚合、倾向于生成不足以解释动态系统的宏观概括的生物质潜力建模不同(Alvianingsih et al., 2025)，跨文化记忆形成研究需要更精细化、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路径，兼顾信仰传递与仪式创新中的微观差异。

（二）隐秘性在国家记忆中的遗产

要理解隐秘性在日本集体记忆中的遗产——尤其与1597至1910年地下天主教相关的部分——就必须考察促成长期宗教压制与适应性生存的心理及社会政治机制。情感压抑现象（即强烈的情感体验因外部威胁被系统性压抑或转化），是跨国与跨文化记忆结构形成的核心动力(Coifman & Aurora, 2022)。德川幕府推行锁国政策期间，公开的基督教实践被定为罪行，可见的教会机构遭根除，信仰被迫转向家庭内部的隐秘空间。这一从公开殉道到私人

存续的转型，不仅要求信徒重新诠释神学，更需进行深刻的认知-情感调整，其内在调节过程必须适应持续的生存风险。

在此语境下，临床心理学中常用的“非适应性调节行为”概念，为理解困境中的社群如何应对情感过载提供了启发性框架(Coifman & Aurora, 2022)。尽管原始研究聚焦于物质使用、社会回避等个体应对策略，但其理论模型——认知控制与特质负性情感的互动——可类比延伸至社群行为。地下天主教徒失去了圣事连续性与教会指导，转而发展出仪式替代物与记忆工具（如规避踏绘的抵抗实践、隐藏祭坛），这些成为嵌入文化的调节机制。这些表面看似被动的适应，实则是需要持续专注与情感克制的高认知需求行为，类似于实验环境中用于测量认知控制的工作记忆任务(Coifman & Aurora, 2022)。个体在感官与符号剥夺条件下仍能坚守教义忠诚，表明其在压力下具备高度执行功能，这与“认知控制可调节对负性情感刺激的反应”的研究结论一致。

此外，威胁感知（无论真实存在还是预期发生）通过复杂的诠释框架介导——这些框架由有限的感官输入与高风险决策塑造，与“知觉不确定性下的情绪感知”研究中观察到的动态相似(Spencer et al., 2017)。在面部表情或言语线索可能象征忠诚或背叛的情境中，准确辨识情绪意图的能力成为生存关键。研究表明，工作记忆容量（WMC）较高的个体，更能根据知觉敏感性调整反应偏差，在模糊的社会条件下优化决策效用(Spencer et al., 2017)。在隐秘基督徒社群中，那些表现出更强认知灵活性的人（或许是长者或指定的精神领袖），可能扮演了类似“情绪调节者”的角色——引导社群解读权威人物的意图，或将预兆与梦境诠释为神圣启示。他们在多重需求冲突中增强的受控加工能力，对群体凝聚力与信仰代际传递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隐秘性的遗产并非仅仅是国家史学中的一个章节，而是跨越认知、情感与生理层面的多维建构。要将其纳入日本更广阔的记忆图景，需要采用跨学科方法，追溯数世纪

以来内在体验与外在约束的交织关系。

五、总结

（一）跨文化宗教记忆的形成

边缘社群的跨文化宗教记忆形成，往往源于情感协商、认知适应与社会历史重构的复杂过程，尤其在长期迫害与文化流离的语境中更为显著。1597 至 1910 年的日本地下天主教语境中，岛原之乱后基督教实践遭到持续压制，加之锁国政策的制度化，不仅要求信徒进行物理层面的隐藏，更需跨世代重构宗教身份。这一转变并非被动的生存机制，而是主动的记忆重构过程——在极端困境下，集体记忆通过仪式即兴创作、符号替代与代际传递得以保存。这些隐秘社群所经历的情感压抑（以悲伤、恐惧与虔诚的内化为特征），成为独特跨国跨文化宗教意识形成的催化剂，这种意识超越了天主教原有的欧洲中心主义框架 (Morgado & Gaspar, 2005)。

此外，受迫害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所承受的心理负担，可通过创伤与文化适应压力的比较模型加以理解——这一模型在当代散居群体研究中已得到验证。例如，针对第二代墨西哥裔美国青年的研究表明，文化适应压力的加剧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情感障碍及物质依赖的易感性显著相关，尤其对那些需应对文化期望冲突与系统性边缘化的女性而言 (Bramadat, 2011)。尽管历史与文化语境存在显著差异，但双重文化压力下的身份协商机制具有启发性类比意义：正如现代移民在原籍文化与迁入地文化间协商归属感，日本隐秘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也在本土神佛框架与受压制的天主教传统间调和信仰，通过融合实践（如崇拜“玛利亚观音”——将佛教偶像重新诠释为圣母玛利亚的隐秘象征）保存教义。

再者，宗教少数群体在重构自身历史时采用的叙事策略，体现了选择性记忆与话语定位的刻意行为。正如加拿大印度裔加勒比基督徒的研究所示，宗教皈依叙事往往嵌入更广

泛的殖民与种族等级体系中——昔日压迫者（如英国殖民者）被追溯性地赋予正面价值，而其他边缘群体（如非洲后裔）则被塑造为对立面(Bramadat, 2011)。类似地，日本天主教社群在口头传承中，将殉道不仅诠释为受害经历，更视为精神抵抗，从而构建了一种反记忆——即便面临国家许可的清除，仍能彰显神学合法性。这些记忆实践表明，跨文化记忆既非静态遗产，也非历史事件的直接复刻，而是受内在心理需求与外在社会政治约束共同塑造的动态、情感负载且认知调控的过程。

（二）未来研究方向

关于1597至1910年日本地下天主教的学术研究，已对长期迫害环境下的情感韧性机制、物质适应策略及宗教记忆嬗变提供了丰富洞见。然而，未来研究需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整合跨学科框架，更有效地解码隐秘宗教实践的情感与认知维度。一个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是将计算情感分析应用于历史文本语料库，例如传教士信件、幕府法令及迫害时期或之后转录的口述证词。通过运用经自适应粒子群优化（APSO）算法优化的长短期记忆（LSTM）网络等深度学习模型，研究者可定量评估不同时期情感效价与意识形态立场的变化[15]。此类方法使历史学家能够超越主观解读，识别话语中的潜在模式，尤其在区分殉道的公开表达与隐秘状态及精神韧性所特有的、更为内敛的内在情感方面具有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需深化对宗教形成中性别维度的研究，尤其通过女性宗教网络中的规训机制与记忆传递视角展开(Anonymous, 2010)。女性在家庭空间中保存礼仪知识、管理虔敬器物及传递圣事记忆的作用，目前仍缺乏充分的理论阐释。对女性教会团体（如无染原罪小姊妹会）的培养手册与个人证词进行比较分析，可揭示欧洲与日本语境中情感调节与制度性记忆建构的相似过程。这将有助于跨文化理解苦行实践、感官约束与记忆技巧如何促进受压制宗教身份的长期存续。

综上，这些跨学科方法——借鉴自然语言处理、情感神学及性别化宗教形成研究——

有望深化我们的理解：在超过两个世纪的隐秘状态中，情感、身体与符号系统如何互动，共同维系了日本的天主教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 [1] Anonymous. (2010). Memórias de formação: Sentidos e sensibilidades durante o início da vida religiosa na Congregação das Irmãs da Imaculada Conceição (1960 – 1990) memories of formation. TMC Academic Journal, 2(2).
- [2] Anonymous. (2012). Greater executive and visual memory dysfunction in comorbid bipolar disorder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 Psychiatry Research, 200(3).
- [3] Alvianingsih, G., Hashim, H., Jamian, J. J., & Senen, A. (2025). Determination of biomass energy potential based 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using adaptive clustering meth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15(1), 46 – 55.
- [4] Bramadat, P. (2011). Religion, race, and remembering: Indo-Caribbean Christians in Canad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79(2), 315 – 345.
- [5] Coifman, K. G., & Aurora, P. (2022). From social avoidance to substance use: Working memory and negative affectivity predict maladaptive regulatory behaviors in daily life across diagnostic group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46(3), 590 – 607.
- [6] Dorcic, T. M. (2005).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essive coping and memory for emotional material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activation and hedonic valence. Drustvena Istrazivanja, 14(5), 827 – 852.
- [7] Goh, R. B. H. (2009). Christian identities in Singapore: Religion, race and culture between state controls and transnational flows.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 26(1), 1 – 23.

- [8] Joormann, J., Levens, S. M., & Gotlib, I. H. (2011). Sticky thoughts: Depression and rumin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difficulties manipulating emotional material in working memory. *Psychological Science: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22(8).
- [9] Le, Y. K., Snodgrass, J. L., Fenzel, L. M., & Tran, T. V. (2021). Acculturative stress and coping processes among middle-aged Vietnamese-born American Catholics: The roles of spirituality, religiosity, and resilience on well-being.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2), 100 – 109.
- [10] Morgado, L., & Gaspar, G. (2005). Adapt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driven by emotional memori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Portuguese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11] Qiang, A., Tsutsui, N. D., Ramirez, S. R., Gurajapu, A., Gerbaulet, M., Adams, S. A., Gillespie, R. G., & Schulz, S. (2024). Chemical species recognition in an adaptive radiation of Hawaiian Tetragnatha spiders (Araneae: Tetragnathida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91(2020), 20232340 – 20232340.
- [12] Senthilkumar, V., Parasuraman, P., Ram Kumar, P. S., Chandrasekar, P., Jeyarajaguru, K. S., Krishnan, S., & Selvaraj, K. (2024). Optimization of ultrasound-assisted extraction of bioactive chemicals from *Hemidesmus indicus* (L.) R.Br. using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and adaptive neuro-fuzzy inference system.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33(2), 327 – 341.
- [13] Spencer, L. K., Ibagón, C., Bui, E., Palitz, S. A., Simon, N. M., & Barrett, L. F. (2017).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is associated with optimal adaptation of response bias to perceptual sensitivity in emotion perception. *SIAM Journal on Applied Dynamical Systems*, 16(2).